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整合:经验及发展

王 蒙

(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摘要:新时期以来,政治整合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依赖于新中国的制度架构,并于改革开放后进行了明显的调整与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整合作为一种“后全能主义”的整合模态,汲取了新中国“全能主义”整合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创新式发展,五大整合路径也各有其成效。不过随着社会情势的进一步发展,此种政治整合也将进入新的改革阶段。

关键词:政治整合;改革开放;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4)03-0010-05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如何通过政治整合化解矛盾和冲突、促进融合与合作,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政治整合是协调并凝聚政治系统内分化的结构和子系统,以维持与改进一个互动的政治共同体的持续过程。通常的整合方式可归结为五种:强制性整合、利益整合、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组织整合、制度整合。

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具有传统的和近现代的历史遗存,依赖于新中国初期的制度架构,并于改革开放后进行了明显的调整与改革,而现时代又受到新的环境的挑战。研究现时代中国的政治整合问题,有必要汲取历史上的经验。

一、政治整合的历史性转换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初步完成了百年来的根本政治任务。同时,国家主义体制确立,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控制型政治整合。新中国初期的政治整合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基本完成,为民生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使民主政治框架搭建起来,为后来的中国大发展乃至“中国奇迹”打下了历史基础;另一方面,“全能主义”的国家结构又造成了政治整合过度,逐渐从

基础型整合转向专断型整合的歧路,民生国家和民主国家构建受阻,发生了“三年灾害”等悲剧。所谓:“成也大政府,败也大政府”、“成也权力,败也权力”,国家成长逐渐脱离了社会基础。“毛时代”结束时,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已凸显,政治整合模式也急需改变,社会需要重建,民心需要重整。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开启标志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用学者的话说,中国“以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为界,前后经历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比较这两个阶段的政治生活,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中国政治变迁的趋势,即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1]。在相继开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一定的政治体制改革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形成,从“总体性社会”发展为分化型社会^[2]。主旋律为“放权、让利、搞活”,社会主调为自由开放。在“邓时代”,国家主义体制已明显弱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改革开放之前是控制型整合,抑制自由化和多元化;之后是治理型整合,发展自由化和容许多元化,政治整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收稿日期:2014-05-02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3SJB810003);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ZZD011);南京工程学院创新基金重大项目(CKJA201206)

作者简介:王蒙(1984-),男,河南洛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

二、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整合的五大路径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整合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之解放思想与扩大自由,发展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经济主义成为实际上的主流思潮;利益整合之经济搞活,发展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满足民生需求;组织整合之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政协等体制内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开放社团;制度整合之法制建设大力推进,恢复人大制度,基层民主制度创设;强制型整合仍然存在,但较少使用。

文化与意识形态整合是指依靠文化资源、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为全社会成员提供某种价值取向,为民众对国家及执政者的忠诚和服从提供理论或伦理依据,促进共同体内部的认同,并通过话语交流与理解,保持文化一致与心理团结。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整合模态更新即是以思想解放和意识形态更新为先导的。“邓时代”开始时面临的困境为,传统意识形态(即革命型意识形态)随着建国后长期的政治运动和建设实践的受挫而濒临破产。激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思想以及平均主义追求带来的各种损失和普遍贫穷,在“文革”结束后已走到尽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代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力和吸引力受到挑战,意识形态面临转型,政府需在合法性意义上重新取信于民。在这种背景下,更加务实、更符合现代人理性的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不再是“政治挂帅”,而变成了“经济挂帅”。新时期的文化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同理想替代最高理想,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禁区和桎梏,也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邓小平理论给人们最大的思想冲击和期望期冀就是“求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改革几无禁区,经济主义成为时代最强音。这就形成了“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或曰“弱意识形态化”,以及“去政治化的政治”或曰“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对于公民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潮逐渐冷却,

基于交换与契约的市场经济消解了狂热的意识形态激情,工具理性代替了追求终极价值的目的理性,个人利益、个性、自主权得到信奉与张扬,世俗化的利益成为个人地位与成就的衡量准则。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新闻业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改革前信息及其发布渠道的垄断局面,人们能够便捷地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丰富多元的信息。在世俗化社会里,各种思想和文化的竞逐侵蚀和消解着僵化的教条式的意识形态。社会人群加速阶层分化、集团分化和陌生化、流动化,不断打破传统的家族、乡里伦理和公私观念,使整个社会建构愈加具备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基础,具备开放、流动、权利、创新的精神观念,是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基石。不过,由于此种新国民文化是在“思想解冻期”迅猛发展的,与之前的高度禁锢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反差和反弹,也和流入境内的各种国际思潮形成了对接,一元化被打破,多元化高涨,思想和理论界陷入某种混乱,也为日后的社会乱象埋下了伏笔。这也表明,单一的经济型意识形态是不够的,新旧意识形态体系间的过渡是艰难的。

利益整合是指通过对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缓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形成有机社会利益共同体的过程。利益整合源于现代权力、权威的世俗化:民众的功利计算,要求得到实惠。利益整合既包括普惠性利益给予,又常有特定的利益输出措施,获得特定群体的支持。这一时期主要的整合手段即为利益整合。经济发展和追求物质生活的时代大潮汹涌澎湃,理性经济人对利益的追逐乐此不疲,国家通过全民经济状况的“帕累托改进”而重新赢得民心。“社会福利的生产和安排是政党国家最重要的、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和政治控制的武器,对社会福利的有效管理是保证社会稳定的主要手段。”^[3]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都保持了世界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在农村,人民公社解体,集体生产式微,“小岗村模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的主流,且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快速增加,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与城市的差距缩小。在城市,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出现,利用改革开放的市场机会快速发财致富;国企承包者也往往改进技术、改善管理尤其是激励机制,这部分管理者和职工

的收入提高;外资经济也重新进入中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培育了中高级白领。整个经济形势呈现出蓬勃繁荣的景象和高速发展的势头,与之前的“文革”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种经济发展也有不平衡不协调的因素,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上亦有曲折,毕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世界性的重大“试验”。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段时期的较高通货膨胀,“物价闯关”失利,人心开始不稳。另外,它与社会政治发展也有不相协调的一面,后者进展过慢,在经济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资源分配出现显著失衡。尤其是在城市,特殊利益群体获取了非法的、更为丰厚的利益,国有经济改革也使许多传统居于优势地位的国企及其工人出现生产和生活困难,对改革的不满有所滋长。这样一个快速变化、利益分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风波。随后的若干年,以“十四大”为标志开启的新一轮市场经济发展热潮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自由度进一步增加,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增强,普通人的获利机会明显增多,一时间“下海”经商成为热潮,大众更加陷入逐利的海洋。利益整合进入新的阶段。

组织整合是指利用各种社会组织体系,将政治人纳入各种体制化的组织活动中,并协调各组织的关系,可以集中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政治活动,实现一致的政治目标。这一时期,执政党首先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老党员干部和有关人士的名誉,重新组织化。“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积存的大量历史问题进行了全面清理,纠正了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大大坚实了干群基础。先后为错划右派分子作了甄别平反并摘掉帽子,为被错划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原商贩和手工业者作了区别改正,恢复其劳动者身份,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对 300 多万名干部进行的错误处理,为 40 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了政策。同时,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使原有的社会积怨从根本上得以消除^[4]。组织整合还包括修复党委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政权系统,改善党的领导,完善民主集中制,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和专断,使执政党恢复在国家体系和社会体系内的政治核心作用。另外,努力恢复政治协商会议,使其发挥政治协商、参政议

政、民主监督的原本功能,实现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整合。1982 年党的十二大确定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又明确提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协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囊括了众多社会精英,有利于社会协调和团结。

这一时期,社会组织整合机制的重新出现与发展,也有助于夯实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它表现为市场契约型交往、基层民主自治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的成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契约性服务的经济利益关系成为基础和主要部分。社团组织也快速成长,成为新型的社会联结。这一时期,除了恢复“工青妇”体制性社团外,还制定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间社会团体也得以一定程度的放开,自发的学术类、兴趣类、经济类团体大大增加,社会组织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从几千个增加到 90 年代中期的近 20 万个,社会活力显著提升^[5]。“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更是新的有效组织形式,以非(直接)政治化的形式实现了城乡社区的社会整合,大大减轻了政府负担,也因贴近性、自愿性能更好地满足民众需求,比如村民自治组织。如学者所言:村民自治是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紧迫性公共问题而对治理体系的变革;其重要特点是向基层社会和公民让渡部分治权,重新构造社会整合体系,它体现着国家以民主化方式重新整合分散化的农民、重构国家与农民之间联系的努力^[6]。村民正是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真切感受和体验到作为村集体主人的存在,可以强化对集体社会的认同和归属^[7]。这些都是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基石,是现代国家成长的深厚伟力所在。

制度整合是指国家法律政策体系以制度性手段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统合,使社会运行符合一定的秩序与规范,形成预期的制度效能。政治制度是一种协调复杂利益关系的整合机制,它反映着各社会势力对制度的公正性与有效性的认同。制度整合的主体往往是政府——它创设了一整套制度体系,不过在现代也愈加显示出社会

主体对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功能。新时期的制度整合创新非常引人注目,在经历了不断的政治运动对国家体系的冲击和对民众权益的伤害后,党的高层痛定思痛,认为制度建设是国之根本。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在八十年代初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9]

于是,新时期加快了宪法和法制建设,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颁布了《宪法》(1982)、《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选举法》、《经济合同法》等。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3年,制定了239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规定,另行政法和法律文件4271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已基本达到了有法可依的水准^[4]。这一时期还恢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大开始充分履行立法、任免、决定、监督等方面的职能,使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落实。各级人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了监督工作;认真审议、决定重大政治决策问题;选举、决定各级政权的领导成员。基层民主制度也获得了大发展。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通过,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原则及其框架。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另外,新时期还创设了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等。

不过,由于我国法制传统的缺乏以及长期的政治斗争带来的制度虚无主义,还因为市场经济基础仍较薄弱,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的整合效力不容乐观。党政职能的定位、党与人大关系的协调、权力主导型体制的改革还需一段时期的努力,立法、执法、司法的公开公正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公民制度化参与仍处于较低水平,再加上1980年代国内外政治格局的多变,制度改革的连

续性与稳定性受到影响。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制度作为核心的整合角色才最终树立。

强制性整合是指政治主体尤其是国家机器利用暴力或行政强制来实现的整合,这种整合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言是必要的,可能达到一定时间的服从与一致,然而又是“无机的”,难以持久,不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凭借对象。改革开放初期,强制型整合仍然存在但已明显减少。政府对媒体的管控仍然比较强势,主流媒体国有化格局一统天下,以确保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遏制思想意识领域的过度混乱,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言论照样进行查禁。比如,及时提出“不争论”,防止思想言论领域的过度多元化影响政治稳定。在社团管理方面,虽然非政治性社会团体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政治性尤其是跨区域的政治团体仍被禁止,避免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在公民表达自由特别是集会、示威方面,这一时期有所放松,然而当出现具有国内外复杂背景的政治动乱的势头时,国家武装力量及时介入,以暴力后盾努力恢复社会公共秩序。该时期的强制型整合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然而也使转型期的中国避免了类似于苏联东欧的剧变衰败局面,捍卫了共和国的政治稳定与长远发展态势。

三、小结

综合来讲,该时期的中国处于所谓“后全能主义”的阶段,政治整合模态也与之相应。它创新地传承了新中国初期的政治整合框架,政治动员这种独特的综合型整合方式大幅度减少,继续巩固组织整合,更加突出制度整合,“无为而无不为”的利益整合也成效显著,意识形态整合与强制型整合相对减弱。

也有学者将该时期特色的政治整合模式或策略归结为“行政吸纳政治”。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政治精英凌驾于一切阶层之上,通过制定和实施向精英利益倾斜的政策,政府有效地赢得了社会精英的政治支持。经济领域和企业组织已基本独立,而在公共领域中执政党则采取较严厉的控制政策,同时着手建立一套带有国家法团主义色彩的管理体制。执政党把部分影响力较大的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安排进政府、人大、政协。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和鼓励经济发展,禁止独立工会,导控舆论,降低环境标准,甚至还有裙带关系等,

为资本家创造了有利的赚钱环境。由于商业化大潮和科研经费政策,知识分子与政府的激烈冲突也消失了。当然,这种精英联盟式的整合也造就了腐败与“赢家通吃”。不仅存在大众利益的被剥夺这一潜在的危险,而且,知识分子与体制的思想张力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将带来的更高层次的自

由民主对权威政治的挑战等,也使该整合具有一定的不稳固性^[10]。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情势的进一步发展,此种政治整合已愈加显示出与国家成长不相适应的一面,政治发展与整合模态将进入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 [1] 俞可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1): 21 - 24.
- [2] 孙立平. 转型与断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 [3] [美]波齐. 国家[M]. 陈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70.
- [4] 刘国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第 4 卷)[G].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4: 88.
- [5] 毕天云. 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组织发展历程透视[EB/OL]. (2009 - 02 - 02) [2011 - 08 - 02].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951>.
- [6] 徐勇.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J]. 学习与探索, 2006(6): 50 - 58.
- [7] 徐勇. 阶级、集体、社区: 国家对乡村的社会整合[M]. 社会科学战线, 2012(2): 176 - 179.
- [8] 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135 - 136.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333.
- [10] 康晓光. 90 年代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研究[J]. 二十一世纪, 2002(8): 33 - 45.

The Political Conformity in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 - up: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WANG M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1167,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period, the concern over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conformity is from the reality in China today. China's political conformity has its historical resources, especially depending on New China's political structure. Then it has been experiencing obvious adjustment and reform. The political conformity in early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s a kind of "post - totalitarianism" mode, learn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New China's "totalitarianism" mode, and implemented the innovation. The five conformity paths also had their effect. Bu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situation, this kind of political conformity will also enter the new stage of reform.

Keywords: political conformity; Reform and Opening - up; totalitarianism; post - totalitarianism;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沈建新)